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吴剑杰
编

张之洞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吴剑杰
编

张之洞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吴剑杰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0-18592-7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张之洞 (1837~1909)-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095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张之洞卷

吴剑杰 编

Zhang Zhido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3.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20 000

定 价 7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的。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张之洞，字孝达、香涛，号壶公、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1837年9月（清道光十七年八月）生。14岁入学，16岁中举。1863年（清同治二年）27岁时，以进士第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居京二十年，其间曾按试浙江，典学湖北、四川，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82年初（清光绪七年底）补授山西巡抚。1884—1889年（清光绪十年至十五年）任两广总督。1889年底至1907年9月（光绪十五年十一月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任湖广总督，其间于1894—1896年和1903年两次短期署理两江总督。1907年9月离鄂进京，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1909年9月（宣统元年八月）病歿，终年73岁，谥号文襄。

—

张之洞出身于普通仕宦家庭。曾祖和祖父都做过知县一类的地方官。其父锷早年中举，后以大挑试令贵州，由知县、知州升兴义府知府。1837年，张之洞便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锷的第四个儿子。张锷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花巨资从外省购回经、史、子、集等多类书籍数十橱，供诸子浏览学习。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5岁入家塾，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

僚属。

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但张之洞的仕途并不平坦，而是布满坎坷。从1863年进入翰林院直到1882年初出任山西巡抚的将近二十年里，他的职衔由编修擢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始终只是一名并无实权的闲散京官，但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头几年，他利用翰林院宽松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查阅了库藏的大量历朝文牍案卷，借以熟悉有清一代的史实典故，也熟练地掌握了各类文书的写作技巧和程式，偶尔还代人草拟奏疏，练就从政言事的文字功夫。他的奏章主题鲜明，构思奇特，行文起伏跌宕，用词华美瑰丽，极具说服力和欣赏性，往往为士人传诵。1867年5月，张之洞得到按试浙江，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机会。他选才的标准是专看学问根柢和性情才识，不太拘于文字格式。这一年乡试，浙江共录取正副榜共62名举人，其中50余人成为日后学术、政坛的著名人物，如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登善、钱雨奎、王棻等。人才之盛，为前后各科所不及。同年冬月，张之洞被朝廷简放为湖北学政，任期三年。三年中，除了两次按临各府生童岁试和主持1869年的全省乡试，还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某些改革。如新科生员复试，例考经文一篇，有固定的格式限制，历来从五经中摘取一句或一段话，限考生用经书中的语言作答。张之洞认为通经在于致用，这种经文考试为格式所拘，未能朴实说理，束缚了考生思想，便将经文改作经解，允许考生用自己的语言诠释解读自己熟悉的经典，阐发大意，于是人才蔚起。又创办经心书院，弱化八股制艺等应试科目的学习，强化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的教育，着重培养人才的学术素质。三年期满，使他赢得了宏奖士类、惜才重教的好名声，被曾国藩誉为自道咸以来“颇惬众望”的好学政。

1870年11月，声名渐起的张之洞任满交卸回京，又过起清秘无事的悠闲生活，直至三年后再次出任四川学政。这期间，他广交京中名流显宦如李鸿藻、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他们过从甚密，或相约登高野炊，探幽觅古，访贤问佛；或泛舟赏荷花，憩饮渔家园；或雅集赋诗，唱和联句；或品茗对弈，或相与考识金石文字。正当盛年的张之洞意气风发，往往成为上述活动的主角，并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和学术文字。这时他更像一位诗人和学者，较少表现出对时政的关心。

1873年11月，张之洞再次出京，就任四川学政。四川偏处西隅，人文未盛，读书人平日所学不外帖括章句之类，以应试为鹄的，孜孜以求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学术空疏。他于省城成都倡设尊经书院，选拔杨锐等高才百余人肄业其中，聘名儒王闿运等分科讲授经史等古学，又捐廉购置经、史、子、集数千卷，建尊经阁庋藏，供学子阅览研习。公务之余，还亲临书院为诸生讲经论史。为使青年学子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致迷惘眩惑，畏难思遁，又亲撰《辘轳语》和《书目答问》两篇，为士子指示治学门径。张之洞认为，学问的门类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无所不通。应各就自己情之所近，志之所存，有选择地研习一二门。治经学则贵通大义，治史学则须读正史、通考和表志，引为鉴戒，不要妄议古人贤否与古事得失，治诸子学则须知体要。又主张博读以广基础，专攻以得要领。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由明理归于致用；认为治学忌分立门派，相互丑诋攻讦，主张调和汉宋之学，兼取所长。

四川幅员广大，辖十五府和十五直隶厅（州），多为山区，少数偏远府州为崇山急流所隔，历任学政鲜有亲历。张之洞不畏险阻，走遍三十个府、厅（州），巡视按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路途的艰险说：所经之地，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加之高原气候严寒，往往大雪迷路，不敢投足。水路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没有一段路程可以让人从容怡旷。他对四川科场积弊之甚于他省早有耳闻，经过遍历各府、厅（州）的实地考察，更具体掌握了科场作弊的种种伎俩内幕。他认为考风直接影响到士风。士为四民之首。士风不正，居乡则为害乡里，为官则鱼肉百姓，必然导致民风浮嚣，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引导士人入前途正道，必须从整治科场积弊下手。1876年4月，张之洞奏报朝廷整饬川省科场积弊的八条措施，即惩鬻贩、禁讹诈、禁拉掭、拿包揽、责廩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

顶替，请求朝廷允许将以上八条著为定章，永远遵行。经过张之洞这番整顿，昔日“弊窦日巧，盘结日深”的四川科场积弊，得以“渐觉廓清”，“士风始为一变”。

张之洞三度出任考官学官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的利病有了较他人更为全面、深切的了解，为其日后推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多了一层思考。

二

1877年3月，张之洞任满回京，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官阶六品。虽然继续做一名无实权实责的闲散京官，却因更多地介入朝政而引起最高当局的注目。

原来从同治初年起，清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倡导以自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学习和引进某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改造旧式军队，以维护和增强国力。在对外方面，主张“曲全邻好”，严格遵守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求保持相对稳定的中外和好局面。洋务派使早年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变为现实，这是历史的进步，并且势必对传统思想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但他们抛弃了师夷长技的目的在于“制夷”的重要思想，实行为保和局而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自然备受责难。在不满和非议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人们中，有一部分人被称为清流派。他们大都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自恃清高博雅，廉介耿直，以指弹时政为己任，思想上倾向于传统、保守，尤其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视洋务派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洋务派的对外妥协退让更是抨击不遗余力，形成一股颇能影响朝局的舆论力量。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既要借重洋务派搞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又担心洋务派权势过重，尾大不掉，便利用清流派来牵制炙手可热的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而此时的张之洞，因其敢言直谏，渐成清流派中的要角，越来越受到太后的青睐。

张之洞的敢言直谏，有三件事值得一书。一是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咸同以来，四川农民负担往往高于法定负担的五六倍甚至上十倍，而东

乡县（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又追加五百文，借以肥己。1875年，东乡百姓相约进城闹粮，要求知县减征税负。孙定扬诬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总督文格派提督李有恒率兵镇压，半年之内，屠戮四百余人。百姓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控告，反被刑部押解回籍，后被处斩，铸成冤案。此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值四川学政任内，有所见闻，回京后不忍坐视，遂为民请命昭雪。1879年5月，他连上三疏，请求朝廷以“诬民为叛”罪，将贪官孙定扬治以死罪，平反冤抑，否则，无以慰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对四川全省之士民。太后见三疏言之凿凿，情切意笃，立即谕令刑部重新审理。刑部改定原判，承认东乡百姓进城“闹粮”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诬民妄杀，判处死刑，包括前四川总督文格在内与此案相关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分别给以革职议处等重惩。沉冤四年之久的东乡一案被张之洞翻过来，声动朝野。二是裁抑阉宦。1880年中秋节前夕，年幼的光绪帝派太监李三顺送八盒点心给自己的生母（太后的胞妹）。行至宫门，被门卫军士玉林、祥福盘诘。李三顺自恃小皇上差使，强行出宫门，双方发生争执，推搡中碰翻食盒。太后闻之盛怒，着刑部严讯，将两名军士革去旗籍，发往黑龙江充苦役，护军首领也严加议处。廷臣闻之，怒不敢言。独张之洞仗义执言，犯颜急谏，奏陈阉宦宜加裁抑，说阉宦恣横，为祸最烈，并列举成例，说明太监未必皆诚实可信，设太监动托上命，私自出入，妄作威福，宫门护军又不能盘诘，“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建议完善内监出入宫门的勘验制度，以便门卫有所遵循。奏折就严门禁立论，不明言门卫军士和太监孰是孰非，但太后心知肚明，立即下令将李三顺杖三十，同时轻减对两名军士的处罚。张之洞此奏让金口玉言的慈禧太后多少改变自己的决定，意义非同一般，被同僚誉为“诤言回天”，而与太后有隙的恭亲王奕訢则逢人便称赞张之洞此奏为“真奏疏”。最能感动太后的是第三件事，即参劾崇厚，修改伊犁条约。1871年，新疆发生动乱，沙俄乘势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左宗棠率兵平定动乱后，朝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地区。1879年，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又割让伊犁以西大片领土，俄国还取得中国赔款、陆路通商和免税等利权。消息传出，朝野哗然。主持清朝外交的李鸿章却出来为崇厚辩护，说他既奉有便宜行事的全权，不能说他无权定约，如果事后反悔，其曲在我，后患更大。清流党人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事岂能放过。张之洞率先发难，首呈

《熟权俄约利害折》，缕析条约中丧权辱国之害，陈述“十不可许”的理由，认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即使冒战争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要求将崇厚治罪，以显示朝廷废约的决心。此折上呈，太后肃然动容，决定单独召见张之洞，面询对策，又特许其随时可到总理衙门献议，以备咨询，并将崇厚交刑部议处，判处斩监候，另派曾纪泽赴俄重议条约。1880年3月，中俄签署《中俄改定条约》，争回原约中被割让的部分领土，挽回某些利权。在一年多的中俄伊犁交涉期间，张之洞先后上疏二十余次，指陈利害得失，权衡轻重缓急，建言献策，虽不免有书生之见，但他坚持认为在强邻虎视的危急情势下，中国必须急修武备，以备为战，以备为讲，“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其忧时爱国之情，耿耿可鉴，并且贯穿其一生。

张之洞居京最后四年的清流生涯，收获颇丰。他的直言急谏博得朝野的广泛赞誉。他对国家和朝廷的忠诚受到太后的赏拔，由六品教习庶吉士很快擢升至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跻身官僚集团的高层。四年中，他还结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朋僚，也熟悉了官僚高层的内幕和官场游戏规则。当然，作为清流健将、被时人称为“青牛（清流）角”的张之洞也抵伤了某些人。他那锋芒毕露“遇事敢为大言”的性情，也曾被人讥为“空谈高论”而不着实际的书生意气，以至二十年后李鸿章还揶揄他此习一点未改。

1882年初（光绪七年底），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从此结束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涯，开始长达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事实表明，他不光会说，也会做，是晚清屈指可数的实干政治家。

三

张之洞到任以前，山西曾连续两年遭遇大旱，赤地千里，民生凋敝，元气大伤，“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加上吏治浑浊，民习颓惰，士气衰微，完全是一个烂摊子。面对此情此景，他没有沮丧退缩，反而激发起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表示只要朝廷信任，求无不允，晋事大有可为。虽不能使晋省变为强省，但可使之成为治省，断不至如从前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他认为民之元气在官，只要各级官吏奉公守法，自然民气振作昂扬，百姓安居乐业。故治晋之道，

首在整肃吏治，正官风以培民气。上任不久，便参革了九名贪纵扰民、昏惰无能的州县官和违例经商、欺行霸市的绿营游击，引起官场震动。他从前任巡抚卫荣光那里了解到，山西吏治败坏，积重难返，全由布政使葆亨、道员王定安等坏法乱纪而起。此两人曾代理巡抚和布政使，在晋为官最久，权势大，而且朝中有人，晋省地方官大都趋附其门，因缘为奸，盘根错节。张之洞敢于碰硬，据实以玩视民瘼、虚糜库款、贻累属吏及公款私存以谋利等项罪名，奏准朝廷将两人革职拿办，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此举影响所及，使全省官风士气为之大变。

在整肃官风吏治的同时，张之洞着手复苏山西经济，务本养民。一是奖励垦荒。山西经连年大旱，人口逃亡，土地大量抛荒。前任巡抚曾明令各地招人垦荒，但急于升科开征，应者寥寥，成效甚微。张之洞奏准朝廷，今后无论有主无主荒地，自认垦之日起三年内概不征粮派差，对无力开垦者，官府酌发牛具种子。政策的优惠，带来了“闻风争夺，惟恐不及”的认垦潮，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二是裁减差徭。张之洞了解到，山西各属虐民之政，不仅在赋敛，尤在差徭。晋省差徭并非无偿役使民力，而是摊派差钱，官吏朋分。又于交通要口设置车柜、骡柜，稽查收费，对过往客户动索数百数千，商旅脚户视为畏途。他飭令各州县必大力裁减差摊，撤除车柜骡柜，不准强索民间一钱，不准骚扰过客一车。经过整治，很快出现众情欢欣，四乡车骡联辘接轳，南北商旅渐有坦途之乐的繁荣局面。三是禁种罂粟。山西全省几乎所有州县都种植罂粟，熬制鸦片，旷地伤农，危及民食。全省官吏士民、兵弁胥役乃至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官不修其职，民不勤其业，遗害无穷。张之洞决心力除此弊，严厉禁种禁食鸦片。他认为以往禁而不止，一是官方态度不坚决，朝令夕改；二是地方官视为利源，奉行不力。他奏陈鸦片不可不禁的四大理由，表示严禁的决心，同时告诫各级官员：本官“惟以能禁与否定地方官之功过，禁绝者优奖，不禁者严参”。在禁烟措施上，先禁膏腴肥沃之地和腹心之地，渐及贫瘠硠薄之地和边厅之地，将禁烟责任落实到基层的乡保社首，不假手胥吏，要求禁之于罂粟播种之前，毋毁之于罂粟扬花之后，免生阻力，激成事端，并要求地方官密访亲巡，竭诚劝导，将查勘情形随时禀报。他相信，如此循序渐进，数年后虽难言务绝根株，但少一畦罂粟，即多一口余粮。对染有嗜好的官弁士子，则多方劝诫，并设戒烟局延医送药，促其戒断，否则宦弁撤差严惩，士子不准赴试。如此恩威并用，雷厉风行，禁烟第一年，

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少种植，过去种植最盛的代州和交城，甚至“一律禁绝”。吸食者也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领药，络绎不绝。禁烟取得初步成效，使他深信山西“三年以后，可期此毒永除”。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禁烟的成功是一个奇迹，没有先例。既然烟毒之害甲于各省的山西能够做到，其他省份更应该能够做到。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的关键诚如张之洞所说：“所以向来不办者，不过大吏畏难，有司好利。天下兴利除弊为难之通患，大率类此。”

抚晋三年，张之洞还在包头、磴口两地建仓积谷，以备灾赈；疏浚文峪河、瓷窑河以兴水利，筑汾河长堤以御水患，培修四天门、韩侯岭等山路车道以便商旅，创办令德堂，维修孔庙、贡院以倡文教，设桑棉局为晋民开生财之源，以及设教案局以调处民教纠纷，筹饷练兵以备边患，严行保甲以靖社会等。以上诸多兴利除弊举措，正如张之洞所言，皆是“儒术经常之规”，即传统的治国安民之道，但并不是每一个封疆大吏都能使之见之于实行。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有定识，有魄力，不畏难，认真、执着地去实践这些传统的儒术经常之规，并取得显著成效，使昔日积贫积弱的山西省开始出现“民有余粮，官有余力”的新景象。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曾经以不谈洋务为高而被称为清流健将的张之洞，在实地治理山西的过程中，面对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国内现实，其思想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方今万国盟聘，中外通商往来，事变日多，交涉日繁，“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为了改变山西省“风气未开，洋务罕习”的闭锁状况，他在省城太原设立洋务局，向省内外延访礼聘通晓天文、算学、水法、地学、格致、制器、公法、条约、外国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器等各类西学人才，并广购西学书籍，供其研求试办，“如有试造新式各器，不得吝惜工本”。同时组织讲演会，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讲授西方各国历史、天文地理及科技知识，令官绅士人前往听讲，藉以开阔其眼界。他还计划引进新式机器开发煤、铁矿藏，购买外洋枪炮装备山西练军。虽然以上诸多举措成效尚未大著，或者未及付诸施行，但毕竟给闭塞的山西省带来了某种新的气息。

四

张之洞抚晋期间，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而日趋紧张。当时，法国已